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沈从文研究资料

上

刘洪涛 杨瑞仁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沈从文研究资料

上

刘洪涛 杨瑞仁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 / 刘洪涛, 杨瑞仁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5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ISBN 7-201-05217-9

I. 沈... II. ①刘... ②杨... III. 沈从文(1902 ~ 1988) - 人物研究 - 研究资料 - 汇编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85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0.5 印张 8 插页

字数: 900 千字 印数: 1 - 4,000

定 价: 84.00 元



沈从文于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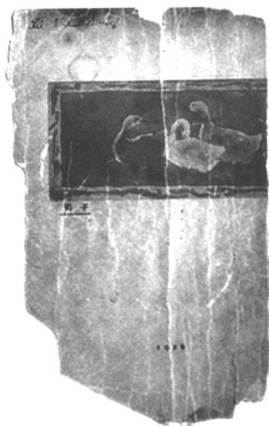


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是本地贡生黄河清之女。她读过不少书，自小随一个兄弟在军营中生活，见识极广。沈从文四岁时，她就教他认字，五岁时已认完六百生字。



辛亥初沈从文家中亲眷合影。沈从文共有兄弟姐妹9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被称为二哥。

1922年沈从文来到湖南保靖，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的军部供职。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字画文物和古籍，学习到传统文化的东西。



1926年出版的《鸭子》，是沈从文出版的第一个作品集。

童年的沈从文，读私塾时学会了逃学，跟着几个年长的学生城里城外到处跑，去认识城乡的各种景物和人事。后来他在自传中还认为，不必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用人事写成的书。



1935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张兆和的老家苏州



沈从文代表作《边城》的两种早期版本



抗战爆发前的沈从文在北平。1937年8月12日，奉教育部通知，沈从文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结伴逃出北平。后辗转南京、武汉、长沙、贵阳等地，于1938年4月30日到达昆明。



沈从文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的几种版本



1949年7月和9月，巴金（左二）两次来北平，分别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和政协会议，期间多次去沈从文的家中看望他。



1972年沈从文在湖北丹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的照片



2002年，为纪念沈从文诞辰10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沈从文生平与创作展。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在我一生中作家我是能提到
 水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
 学会用小，脑子里去思索一切全新
 这一点点，也显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款步一切的时候，
 自己即这是一句真话，我对我自己的
 环境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
 水不能分开。

年轻的时候七岁时，我整在我看来
 我不能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无论如
 何的日光下生活，大日月里，无一些同街以
 手作下了一个记号，捆在本街土地堂的水
 到城外去，进入高身及身的森林，森林
 可以烤炙，也毫不存在。早晨中，只听
 一个心只与孤独，这种颜色黄色，跳
 来的东西已代替了一顿早餐了，另到河边

沈从文手迹《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这篇文章讲道：自己的文学事业，并不建筑在一本或一堆合用的书上，实在却只是建筑在“水”上。该文于1934年7月在《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同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沈从文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前言

刘洪涛

最早评论沈从文的文字，是唯刚（即林宰平）1925年写的《大学与学生》，文中引述沈从文早期散文《遥夜》，称其“全文俱佳”，赞作者是“天才青年”。徐志摩在沈从文的散文《乡村市集》后加了一段点评文字，称赞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早年提携过沈从文的人还有胡适、杨振声、陈源等。30年代，沈从文跻身京派作家队列，受到朱光潜、林徽因等学者作家的赏识和支持。鲁迅早期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卷》时，也未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先生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伟大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一位文坛名人周作人在回答期刊提问，他最喜爱的书是什么时，提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于沈从文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9年以前，沈从文这样的现代作家并未成为自觉的学术研究对象。但由于为数不多的沈从文评论，与他的创作同时进行，对其创作产生了影响。在关于沈从文的批评中，左翼的观点占据主流。论者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桁《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

明的立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受到种种非议。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亦被对立方批评过。对沈从文的这种批评倾向的极端发展,是 1948 年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8 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论及沈从文发表在 1948 年 1 月 3 日天津《大公报》上的《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撰写此文是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这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重磅炸弹,给正躊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 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过,但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1949 年之前的批评文字,也注意到沈从文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虽常常语带贬抑,但感觉是敏锐的。如说沈从文的擅长讲故事,作品中的牧歌风,异国情调,叙述的“游戏”或“客观”态度,对风土人情描写的重视,融合了土语和外来句法而形成的小说语言的特异性,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联系等,都颇有见地。苏雪林在《沈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执着于凸现湘西区域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征,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上述种种命题,

为 70 年代后期大规模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这三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皆以反面形象出现。例如王瑶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节,另外,在“抗战文艺的动向”、“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的题目下也有关于沈从文的部分。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沈从文进入文学史,也始于这一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中期的沈从文研究,明显带有论争性。被反正统的激情鼓动着的研究者,要求对尘封土埋已久的沈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左翼革命文艺传统的纯洁性出发,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如 1980 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 年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但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益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 年),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司马长风、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尤其是金介甫,他 1977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以及 1987 年出版的传记《沈从文的奥德赛历程》,对沈从文进行了更系统、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研究。随着他们的著述在大陆传播,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历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大陆学者以极大影响和启发。此外,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日本学者小岛久代、城谷武男、齐藤大纪、中野知洋、福家道信等的沈从文研究,在

沈从文作品的文本细读、背景材料的搜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20世纪80年代以降,沈从文研究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展开,成就斐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如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现代乡土文学、湖南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沈从文与先楚文化,与湘西区域文化、历史、地理的复杂联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文学的关系。其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沈从文的创作与所在城市,如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沈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沈从文散文、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研究等等。二十多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有力推动。借助于前者,学者们从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起作用的角度,看待沈从文创作的文化优势和局限,并衍生出众多命题。后现代的文化冲突观念,又促使学者开始强调沈从文对区域文化合法性、独立性的维护,以及他创作中渗透的区域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的潜在冲突。有研究者还把沈从文放到后发达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研究其创作中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中国形象问题、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问题等。沈从文作品的庞杂、丰富、深广,为不同阐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当然也在不断挑战着研究者知识和想象力的极限。

这一时期,在大的较为一致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们的研究各具特色。凌宇是“文革”后中国最早开展沈从文研究且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1985),把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肖像全貌作了清晰的描画,对他的文学成就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其间凌宇

又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发表,拓展、深化了专著中表达的观点。赵园在长文《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1985)中,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城市”看成被叙述出来的艺术世界,是两个相互依存、相互阐释的系统,指出它的虚构性承载了作者的观念及其变化,在相反相对的两个文化区域内,勾勒出作家的形象。王晓明的《“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1987)一文,从分析沈从文小说文体入手,以作家精神、思想变化为依据,论证了沈从文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过程。王晓明认为,沈从文在1934年创作了《边城》之后创造力逐渐衰竭,此文着力探讨沈从文创作走向衰落的内在原因,指出这是由于沈从文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由一个反历史进化论者变成了历史进化论者,由一个乡下人变成了绅士,“审美感受的变质”成为妨碍他前行的“最致命”障碍。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1990)一书,探讨了沈从文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沈从文对中外文化的融会和整合。此外,贺兴安的《楚天不死凤凰鸟——沈从文论》(1992),王继志的《沈从文论》(1992),韩立群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1994),向成国的《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1997),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1997),《〈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2003),杨瑞仁的《沈从文与福克纳比较研究》(2002),刘一友的《沈从文与湘西》(2003)等专著,都各有所长,且扎实严谨,论证可靠,对沈从文研究卓有建树。

其二是沈从文著作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沈从文选集》、《沈从文文集》、《沈从文别集》、《沈从文全集》先后出版。各种沈从文传记的出版是一道可观的学术风景。凌宇的《沈从文传》(1988)有开山之功,传记饱含激情,在沈从文的人生、创作经历与时代大潮的互动关系中感慨兴会。《我所认识的沈从文》(1986),《怀念沈从文》(《凤凰文史资料》第2辑,1989),《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1989)等,辑录了沈从文亲旧故知、学者撰写的

回忆怀念文章。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1991)汇编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 80 年代沈从文研究的主要论文和论文索引,沈从文作品版本目录。杨瑞仁的《沈从文研究专题目录集》(2002),沈虎雏、沈红等对海内外沈从文著作版本的搜集和考订,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1991),对沈从文的思想发展脉络有清晰、系统的论述。李辉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1992),在史实考证方面作风扎实,亦开创了沈从文作品版本汇校的先河。糜华菱的《沈从文生平年表》(1998),总结了邵华强等学者研究沈从文生平事迹方面的成果,并提供了许多新鲜材料。这些都使沈从文的性格面貌逐渐清晰丰满,一个“不随流俗,政治上独立思考,文学上锐意探索”的形象日见鲜明。

其三是艺术品评工作的加强。汪曾祺选编、题解、注释、赏析的《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文风清丽,对沈从文作品在细节的观赏上常有出人意料的新鲜意见。吴立昌的《沈从文作品欣赏》(1988),赵园主编的《沈从文名作赏析》(1993),收入了众多学者对沈从文作品的高妙识见,是对沈从文众多名篇的全方位大规模的细读。万燕的《沈从文幽默散文赏析》(1994),也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

沈从文一生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1949 年以后,他逐渐转到物质文化史研究,留下了可观的成果。对沈从文这方面成果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有参与协助过沈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同志如王亚蓉、李之檀等写了一些回忆、评述文章及著作,《沈从文全集》的出版,让读者能够一窥沈从文构建的巨大的艺术庙宇的堂奥。但比较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外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 90 年代